

生活环境主义与环境社会学范式*

Living Environmentalism and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Paradigm

赵素燕 任国英

内容提要 “生活环境主义”主张在解决环境问题时,不简单地推行自然环境主义,让居民彻底远离环境,这是不切实际的。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挖掘当地居民的生活智慧解决环境问题不失为一种折衷的办法。环境实在论和环境建构论在环境问题演化的不同时期解决了环境问题如何产生和呈现机制问题,但并未在解决路径上引入范式研究。生活环境主义在解决路径上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式。

关键词 生活环境主义范式 新生态范式 政治经济学范式 建构论范式

作者单位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太原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山西太原 030024

Zhao Suyan Ren Guoying

Abstract: “Life Environmentalism” insist that when solv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not simply implemen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alism. It is impractical that keep residents completely from the environment. So respecting the wishes of local residents, digging the life wisdom of local residents to sol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may be a compromise. Environment positivism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vism solved the problem “the cause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how environmental problems generate” at different times in the evolution of environment. Which did not introduce paradigm in resolving path,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living environmentalism provides available reference paradigm in resolving path.

Key words: living environmentalism paradigm,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political economy paradigm, constructivism paradigm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各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环境问题。社会学作为具有很强人文关怀和包罗万象的学科,以其独特的敏锐性捕捉到了环境这一重大议题,环境和社会的关系进入了社会学家的视野,环境社会学由此产生。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在美国和日本发展较好。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过高速经济发展期后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日本的社会学虽然是舶来品,但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环境社会学有很强的本土特色,完全是在没有美国的影响下独立发展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比美国还早。它们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环境问题。可以说,日本的环境社会学是在环境问题的实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美国的环境社会学则是试图将社会学的主流范式由“人类例外主义范式”转换为“新环境范式”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客观而言,环境社会学的建立更多地受到了西方环境社会学的影响。但日本环境社会学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

*该标题为《重庆社会科学》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环境社会学范式何以可为?——重温“生活环境主义”》。

自环境社会学发端、发展到现在,形成了环境社会学的多种范式。关于环境社会学的范式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有学者梳理了环境社会学中几种经典范式。在现有研究中,日本的环境社会学受到关注较少,未将日本环境社会学中有影响的理论纳入研究范式之内。这里认为,环境社会学范式的发展可以划入发展阶段来看,鸟越皓之的“生活环境主义”可以算作一种解决路径上的研究范式。这里分环境公害、开发问题期和环境问题普遍化时期两个时段来论述。环境公害、开发问题期主要有新生态范式和政治经济学范式,前者关注的是由于人类中心主义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后者则关注社会系统运行的深层机制所决定的环境问题产生。二者都在环境实在论的视野中分析环境问题。环境问题普遍化时期的建构论范式,则更多地关注环境问题的呈现机制。但二者都未关注环境问题的解决机制。

一、环境公害、开发问题期^①的范式

环境公害、开发问题期主要有新生态范式和政治经济学范式。不同范式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给予了不同解释。

(一)新生态范式

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工业化带来的大机器时代的来临,使得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世界八大公害事件都是在“二战”后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发生的。社会学家敏锐地开始反思在人和自然关系中的传统范式的弊病,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指导下,人类肆无忌惮地利用一切可能为人类创造利益的世界万物。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观念最终使人类遭到了惩罚。反思传统范式弊病催生了新生态学范式NEP。新生态范式颠覆了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主体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思维导向,倡导人和自然平等对话。

1978年,美国社会学家卡顿和邓勒普发表题为《环境社会学:一个新范式》的文章,标志着环境社会学的创立。在文中,卡顿和邓勒普挑战了传统社会学研究范式——用社会事实解释社

会事实^②的模式,指出“以往的社会学理论尽管从表面上分歧对立,但都具有人类中心主义这一共同点”,并将传统社会学在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范式上概括为“人类例外主义范式”(Human Exceptional Paradigm, HEP),认为这种范式是一种将人类凌驾于自然和环境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利用和被利用关系,这种将人类和自然置于不平等境地的思维导向,不利于认识环境与社会的关系。这样卡顿和邓勒普根据从意识上颠覆了传统的人类和环境“范式”,提出来与之相对的开启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及新环境范式(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NEP)。构成这一新范式的基本假设^③为:社会生活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的生物群落构成的,人类只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复杂的因果关系及自然之网中的复杂反馈,常常使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产生预料不道德后果;世界是有限度的。因此,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其他社会现象,都存在自然的和生物学上的潜在限制。

面对环境问题的凸显,依然沿用社会学传统研究范式中的“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难以逃脱人类中心主义这一不平衡关系的窠臼。卡顿和邓勒普跳出这一既成的解释框架,从更为根本的人类意识入手,指出了当今环境问题显著的思维导向原因,在环境社会学发展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今天同样值得深思。

(二)政治经济学范式

如果说卡顿和邓勒普的新环境范式犹如“一语惊醒梦中人”之效,使人们在“先于环境破坏之前的社会事实”中寻找原因解放出来去寻找另一条路子反思环境和社会的关系。“政治经济学”范式则在环境和经济中找到了一个人类

①日本环境社会学家传桥晴俊把日本环境问题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即“公害、开发问题时期”和“环境问题普遍化时期”。转引自包智明:《环境问题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日本学者的研究》,《学海》2010年第2期。这里在环境初发期时,沿用这一说法。

②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原则》中指出:“一个社会事实的主导成因必须到其先前的社会事实中寻找,而不可能在社会意识中找到。”

中心思维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施耐伯格在《环境：从剩余到匮乏》中勾勒出了环境破坏与经济扩张之间的矛盾关系。施耐伯格的理论是在广泛汲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新韦伯主义社会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主要从经济和生态之间的关系入手回答了环境问题的原因，他关注的核心议题是“环境衰退的社会根源是什么？究竟谁应该对环境破坏负责”。他回答了“环境和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2]：社会的经济扩张必然要求增加从环境中开采原料；环境开采物的增加不可避免地造成生态问题；这些生态问题为以后的经济扩张埋下了潜在的限制。

社会和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是施耐伯格所说的三个合题：经济的合题、有计划匮乏的合题和生态的合题。“经济的合题”是通过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增长解决经济扩张与生态破坏之间的对立关系；“有计划匮乏的合题”即是在维持或达到适度经济扩张的同时，只注意处理某些最严重的环境问题，这在根本上无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生态的合题”即通过严格限制或减缓经济扩张，以求仅仅利用可再生资源维持生产和消费，这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措施。三个合题中“经济的合题”是前提，施耐伯格指出了资本主义追逐利益的本质最终将导致“生产跑步机制”^①的诞生。这是解释环境和社会关系紧张的源头，同时指出了在资本积累的上升期，想通过“生态合题”来解决似乎有些痴心妄想。资本逐利的本质使得经济合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有计划匮乏的合题作为一种合理的选择似乎有悖资本主义的本质，生态的合题更是一种理想状态。施耐伯格形象地将资本逐利的本质所导致的对资源破坏的循环称之为“生产跑步机”，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就像跑步机上的生产永不停歇进入自我强化的机制当中。这种紧张关系是由生产跑步机和环境保护需要之间的冲突引起的。生产跑步机理论在新环境范式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新环境范式尽管从思维导向上颠覆了之前的人类中心主义。但这一发现在施耐伯格看来只是表象，它并没

有从社会机制的深层动因进行分析，人们更应该关注社会系统制度层而运行的本质。施耐伯格提出的三个合题中，后两个合题相当于解决路径，但由于“生产跑步机”的内在机理并不能实现。这一理论从社会机制的运行本质上揭示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冲突。施耐伯格既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与辩证紧张，又提出了与之相悖的解决路径。因此很多学者也对它的合题进行批判。这里认为，这种看似悖论有些矛盾的主张正是客观现实决定的，是社会系统的机制本身决定的。三个合题的提出是其睿智的彰显，是一个学者的美好愿望，同时我们也看到结构性因素对人行动的制约。

二、环境问题普遍化时期的范式

环境问题普遍化时期的范式主要包括环境建构论范式和生活环境主义范式。

(一)环境建构论范式

新生态范式探讨了人类的社会行为如何影响环境问题和环境功能，以及环境问题本身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关注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层原因对环境问题的影响，二者都属于环境事实论的范畴。环境实证主义范式关注现代工业社会和人们所居住的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实证主义范式是用传统社会学的经典分析方式分析环境议题，关注环境问题，将环境问题看作真实的、可证明的、实在的自然问题，而建构主义范式虽然并不否认实证主义范式所认可的自然因素，但认为环境问题的涌现更多地是建构的产物。环境问题不是完全客观的，而是通过人为有意建立起来的，是建构的产物。建构主义范式强调自然的社会建构性，主张关注环境问题的呈现机制。

1973年，斯佩克特和科茨尤斯发表《社会问题的重构》一文，书中将社会问题定义为“群体活动，目的是向一些组织、部门和机构就一些公认的社会状况进行投诉和提出主张”^[3]。此文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直接挑战了传统的

^①因翻译的不同，有的称为“苦役踏车理论”，有的称为“生产涌动机”，这里采用了“生产跑步机”这一翻译方法。

实证主义范式,并经过多年的建构论理论的发展成为研究环境问题的另一范式。建构论范式认为环境问题不只是源于我们对客观现实的体认,它同时也是社会建构和界定的结果。比如风险社会属于典型的建构论范式。贝克的“风险社会”是从社会变迁的宏观社会学视角切入环境风险研究的。他认为,西方国家正从工业社会迈向风险社会,工业社会是财富分配的社会;风险社会则是风险分配的社会。同时他还指出:“生态运动不是一次环境运动,而是一次内在的社会运动,它将‘自然’用作某些问题的参数。”^[4]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打破了过去科学对理性的垄断。科学在变得“越来越必要的同时,也显得在建立对于真理的社会性定义方面越来越不充分”,贝克将严格的“科学理性”与一种新的“社会理性”进行对比。在反思科学理性的过程中,贝克坚持认为,“饥饿是分等级的,烟雾是民主的,民主不应该终结在实验室门口。”正如里德斯科格在对《风险社会》的评论中所指出的,贝克是自相矛盾的。^[5]一方面,他认为,由于客观的可证实的全球风险的增加,地球正处在日益扩大的危险中;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风险完全是社会建构的,因而超越我们的认知它们就不存在。

贝克一方面把世界描述成为充满危机和风险,另一方面把这类风险看作社会建构的结果。多数评论者认为贝克这一看法存在着矛盾关系,自身透露着紧张。但不可回避的是,贝克确实看到了环境危机的客观现实存在和建构的双重属性。我国的秦淮河污染治理等重要河流的治理都是双重属性的现实体现。一方面河流确实存在受污严重的简单事实,另一方面河流的污染在彼时没有成为问题在此时却凸显了出来,不得不承认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客观现实加之一定的外在条件使得问题具备了建构的社会环境。这样各地的环境逐步得以浮现,比如秦淮河因“十运会”召开而使其污染问题凸显出来,是客观事实和社会建构的叠加。当然社会建构的可能性主要存在于具有不确定知识的社会事实上。正所谓“一个问题的事实不确定性越强,

就越容易被社会建构”。在环境科学知识上,许多现有的科学并不能作出明确精准的定论,我们并没有掌握垃圾焚烧或建立发电厂的精准危害,因此这也给建构论范式有更多的生存空间。贝克的内在紧张是不可避免的。贝克能看到环境危机和风险显现的双重属性是基于当今现实世界中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这恰恰是贝克提出风险出现条件的特殊贡献。

(二)生活环境主义范式

在环境社会学中,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到了新生态范式、政治经济学范式、环境建构论范式等。已纳入环境社会学范式的基本可以分为环境实证主义范式和建构论范式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的产生主要是发端于环境议题的产生机制,至于环境议题的出路则鲜有人探讨。现有的范式基本吸纳了西方的主流范式,基本未受到日本环境社会学的影响。二者处于一个相对割裂的状态。日本的环境社会学兴起较早且具有很强的本土色彩。这里认为,已有的环境社会学范式解决的是环境产生机制问题,而鸟越皓之的“生活环境主义”则很好地回答了环境解决的出路问题,不妨也将其作为重要范式之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鸟越皓之、嘉田由纪子等在对琵琶湖周边环境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对于环境领域中很多问题,环境治理科学模式与当地相关者以及居民的想法相差甚远,两者之间距离相差之大甚至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并深感需要形成一个能使居民和行政人员都能接受的相对比较好用的环境理论模式。^[6]于是,经过不断调查,集思广益,提出了生活环境主义的理论范式。重视保护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和体系,在处理环境问题时重视当地生活者的生活实践,遵从当地生活者习惯态度的做法可称为“生活环境主义”。生活环境主义强调当地生活者本身的重要性,弥合了政治经济学范式三个合体、环境建构论范式论述的紧张。表面看来,资本自身追逐利益的属性使得资本对环境的破坏不可避免,风险社会的环境危机既是客观存在。同时又是社会建构的。然而,无论是资本对环境的破坏,还是社会建构出来

的环境风险，都是需要人类付出努力将其消解的，生活环境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回答了解决环境问题所遵循的宗旨。环境毕竟是当地生活者的环境，一切问题的解决理应遵循当地人的立场和看法。这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模式。

日本学界存在着“受益圈与受害圈”理论、“环境两难论”，前者主要回答了环境问题存在及环境抗争的原因，后者回答了环境之所以遭到破坏的原因，但都未涉及环境问题如何治理这一议题。鸟越皓之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空白。

三、结论

美国社会学家卡顿和邓勒普发表的题为《环境社会学：一个新范式》给环境社会学注入了新的血液，指出“以往的社会学理论尽管从表面上分歧对立，但都具有人类中心主义这一共同点”，并将传统社会学在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范式上概括为“人类例外主义范式”，认为这种范式是一种将人类凌驾于自然和环境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卡顿和邓勒普的新生态范式一语中的，指出了环境问题发生后所隐藏的人类—自然关系的不平衡。政治经济学范式运用了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揭示了环境问题和资本关系的二元对立和不可调和。“生产跑步机”的形象称谓深刻揭示了在资本发展的过程中，环境问题的不可避免，施耐伯格的三个命题尽管提到了环境问题的可能解决路径，但囿于资本发展的现实恐怕是水中镜月不可实现。进入工业高速发展期后，人类社会也进入了各种风险云集的时代。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这种风险一方面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给了建构主义更多的发展空间。贝克充满矛盾的论述尽管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但应该看到其所受到的批评正是贝克的功绩，他看到了风险社会中环境危机的客观性和社会建构特性。三种范式可以

划归为“环境事实论范式”和“环境建构论范式”两大阵营。前者关注的是环境问题的发生机制，后者关注环境问题的呈现机制。但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路径则遭到了冷落，这也正是环境问题棘手的表征。日本的环境社会学发展较早，且发展具有很强的本土性，但在环境社会学范式当中更多地还是受西方环境社会学的影响，日本环境社会学发展的本土性使其与当地人有更多的互动，更容易提出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研究认为，生活环境主义关注到了当地居民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通过挖掘当地人的生活智慧并将其图式化，形成了鸟越皓之的“生活环境主义”。生活环境主义倡导环境治理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当地生活者的意愿，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已有范式当中更多地较为宏大地分析环境问题的产生和呈现机制，在最为实际和关键的解决路径上并没有关注太多。事实上，真正解决环境问题还需要行动来制衡结构，最终达至“结构——行动”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活环境主义为研究环境问题注入了新的血液。

参考文献

- [1]洪大用：《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阐释》，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0页
- [2]洪大用：《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83页
- [3]Spector, Michal and Kitsuse, J. I. Social Problems: A Reformulation. *Social Problems*, 1973, (20): p.145.
- [4]BECK U. *The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2.
- [5]Lidskog, R. Review of U. Beck, *The risk Society*, *Acta Sociologica*, 1993, (4): p.3.
- [6](日)鸟越皓之：《环境社会学——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思考》，宋金文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年

(责任编辑：莫远明)